

<http://www.jintian.net/today/html/45/n-1745.html>

最后的共产党人(上)

发布：2008-8-21 22:18 | 作者：嘉蔚

马来西亚青年导演阿米尔莫哈末的纪录片新作《最后的共产党人》于 2006 年 2 月首映柏林电影节，3 月再映多伦多加拿大国际纪录片影展，4 月三映新加坡，同月马来西亚电影检验局“一刀不剪”准予向公众放映，但随即遭遇来自许多方面的强烈反应，而于 5 月被禁止在其祖国上映。

被禁原因，是该片涉及共产党的历史，提及了一个叫陈平的人。

陈平是谁？

搜索 Google，“陈平”是北大教授，“陈平”是山水画家，“陈平”是中共区委书记，“陈平”是摄影家、内科医师、法律学人、宅急送总裁、项目经理、逃亡博客、杀妻后被处决的原检察长，“陈平”是台湾作家三毛，“陈平”是刘邦与项羽的谋臣……

“陈平”是个太普通的姓名。甚至就在同年 1 月，笔者刚刚在塔斯马尼亚结识了来自广州的青年画家陈平。

而“最后的共产党人”陈平，他其实名叫王文华。当他 15 岁宣誓加入马来亚共产党时，取党内化名为“王平”。后来他也曾自称“陈金生”以及其它十几个假名。直至被外界误定名为“陈平”。从此，“陈平”名下的人物介绍增添了一项：

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1947— ），1924 年生于马来亚霹靂州，父亲是福建移民。英帝国“缅甸星”勋章、“1939—45 星”勋章和英帝国勋爵士团 OBE 勋章获得者。也是英帝国与马来西亚政府头号通缉犯。

追溯历史之一

陈平 15 岁入党，八年后跃升为总书记，除了他本人的才干以外，实在源于一段悲剧性的党史。马来亚共产党于 1930 年 4 月底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成立，主持创党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胡志明，中共南洋临委会的领导傅大庆等与会。郑超麟回忆录载傅大庆后来在加尔各答被捕引渡回国，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也被逮捕的胡志明，胡请他通知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傅在龙华看守所遇见留苏同学郑超麟，转告其事。其实郑在当时已成为托派，被中共视为敌人。但郑还是设法转达此讯给中共。六十多年后名扬海外的作家戴晴求见九旬老人郑超麟，告知郑她是傅大庆的女儿。傅已在抗战初期被日本人杀害。

马共成立四年后，一个名叫莱特的越南人进入党内，自称有共产国际背景。其后五年，马共高层领导先后被捕，或死或逐，莱特成为无可争议的唯一最高领导。他在总书记任上一干八年，跨越整个二战，被年轻一代党员视为“马来亚的列宁”。事实上，他是越共的叛徒，英国当局的线人。在日军入侵马来亚的几个月后被捕，又成为日本当局的合作者，并设计杀害了大部分马共高级负责人。他的真实面目直至 1947 年才暴露。23 岁的陈平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并成功地将莱特绳之于党纪。一个共产党被一个多重间谍控制近十年，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所仅见的例子。与斯大林诬指党内元老为“间谍”不同，这已是历史定论。

尽管有如此特殊的机遇，陈平的脱颖而出，仍有赖于他早熟的组织才干与政治能力。他在 18 岁那年组织起抗日游击队，19 岁成为英军 136 部队的马共联络人。所谓的 136 部队实际上是一组英国情报军官与中国军队情报人员，由潜艇或空投渗入日据马来半岛。他们完全依赖于马来亚唯一的抗日力量即马共抗日军的保护。陈平实际上成为负责保护的马共最高层领导人与军事组织者。他的英方同盟者给予他如此的评价：

“非常勇敢并博得尊重，不拘小节或形式。体格强壮，圆形孩子气面孔。性格文静，思想敏锐及能力非凡。坦诚及可信赖。非常随和。”

“CTP（即陈平）是霹雳抗日军的首领，……他是一位有能力，明智，讨人喜欢的人，……几乎完全是因为他，我们今天在马来亚才能有 30 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连队，随时可以攻击日本人的交通线。也是由于他，抗日军队的首长们才能与和他们在一起的英军联络部队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

追溯历史之二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时，13 岁的陈平尚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而一心想要报效当时他心目中的祖国——中国，去中国投军打日本。其实他这种状态的爱国心代表了当时大多数马来亚华人的国家认同。

在二战前，马来亚半岛是由英帝国直辖海峡殖民地，即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三城，以及英帝国全控或半控的一批苏丹小国（州）构成的一个政治地域。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华人，大多数因锡矿与橡胶开发的经济原因而于 19 世纪以来移民自中国本土。直至那时甚至并不拥有马来亚公民权。1931 年“九、一八”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中国人民对日帝的强烈仇恨。马来亚华人也自然成为日本南侵的天敌。而马来亚共产党是最早自觉地将创建一个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作为政治目标的当地政党。这两大因素使马来亚共产党与英国殖民当局势不两立，同时又在日占时期建立短暂的同盟关系。此外，也使得在日占时期迅速壮大的马共，成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政党。因为对与日本人没有血仇的大多数马来人而言，至少英国人比日本人还更厉害地剥削了他们，况且日本人许诺要给他们以独立建国的前景，所以马来人多数与日本当局合作。日本人占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全境后，主要屠杀对象也是抗日华人。

1942年初眼见马来亚即将沦于日本人之手，英国当局在最后时刻，打开牢门，释放马共政治犯，直接送他们进特种学校，教会如何使用武器后，匆匆将他们投入战线后方。在英军溃退的战场上，马共人员收集武器，一支支游击队成立。与此同时，华人中部分土匪成性者也乘机聚众山林，捡起了武器用以打家劫舍。这种情景颇似“九、一八”之后的满州地区，或者“七、七”之后的河北一带。甚至在河北拉起一支游击队的一个中共政委，也是名叫王平。由于共产党游击队纪律严明，土匪武装便打起国民党的旗帜。不过在马来亚，当时真正的国民党抗日力量是英军 136 部队里的情报人员。其中职务最高的一位真名叫林谋盛。他与陈平是战友。是陈平将他从潜水艇护送进深山基地。一路上他对陈平大谈国民党观点，陈平则装聋作哑。后来他们便“井水不犯河水”。虽然陈平对国民党成见颇深，但并不妨碍他对牺牲于日本人酷刑之下的林谋盛作出公正的评价。陈平后来对笔者说：他们以为林是阔人家出身的公子哥儿，会经不起日本人刑讯而叛变。但结果没有。“他是一条汉子。”陈平对我说。事实上，马共队伍在它几十年武装斗争中，叛变是家常便饭。甚至党内有共识：人对酷刑的忍受有限度，所以允许被捕人员屈服之后回来继续为党效力，当然附有立功赎罪的条件，并且不许重新入党。由此可知陈平这一句评价的分量。

抗日战争胜利到来之时，陈平与党内同志均以为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已指日可待。它将独立于全世界民族之林。而此时马共正规武装有五千余人，是马来半岛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日本人训练组成的马来人武装也来联络要共同抗英。戏剧性地，日本军队也提议配合马共抵抗即将登陆的英军。如果此事成真，马来亚或许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第二个印尼。但此时总书记莱特下令迎接英军回马，并取消了对独立和民主共和国的诉求，还根据英国当局指示，解散了全部马共正规军。马共失去了它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历史性机遇，永远地与之失之交臂。而且事实上，依然付出了暴力与杀戮的代价。

1948年，清除了它的间谍总书记莱特之后的马共揭竿而起，开始了武装独立斗争。这场未被正式称为战争的残酷战争持续了十二年，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受到马来亚独立运动冲击的英国当局如他们在印度、缅甸、中东等许多前殖民地所做的一样，明智地提前推出独立时间表，将政权交给当地信得过的政党，让其独立。对马共的斗争而言，英国的对策无疑于釜底抽薪，使它的“为独立而战”的旗下顿失大部分中间立场支持者。加上军事对策“新村”运动的成功，到1960年，迫使已无法在国内生存而只能寄居泰南边境的马共决定放下武器，改走政治斗争一途。陈平也在党内达成这一共识之后，离开丛林，生平第一次经越南抵中国，并且作为马共总书记在中国一住二十八年，不再直接负责一线作战。

约会历史之一

笔者与澳大利亚怡保集团前主席叶林生先生已有十年的交往。叶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人，对祖国一往情深，十年来一直要求我为他创作一幅马来西亚历史画。今年年初他邀我午餐，讨论安排我去马来西亚参观的日程。席间他提到一个名字：陈平。“陈平？就是马共总书记？”我很惊奇。一个大资本家与一个共产党大头目，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关系。“是的，我俩的父亲是朋友，他们来自同

一个村子，所以两家是世交。”叶先生在不久前刚刚在曼谷与陈平吃饭聊天。我立即问，可不可以在我访问马来西亚时也安排见见陈平。叶先生满口答应，而且一诺千金。

我对马来西亚，此前几乎一无所知，包括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那么为什么我知道陈平，而且又那么对他有兴趣？那全因为我记忆中一条难以磨灭的旧闻：1989年年底，我从报上读到一条简讯，大意是马共总书记陈平与马、泰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这条消息当时着实让我激动。因为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罕见的例子，同时它又切合我对于“和解”的向往心情。报纸毫无后续报导。因此对我而言，“陈平”这个名字继续笼罩在历史的烟雾背后。

追溯历史之三

对于国际共运而言，1989年是一个比1917年还要震撼世界的年份。从这一年六月初北京长安街上的杀戮开始，到这一年年底布加勒斯特城里的激战为止，血腥味标志了共产主义旗号的社会制度被它所统治的人民大众扬弃。但除了这两三个城市之外，几乎如同瓜熟蒂落一般，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必付出生命代价，便冲决了所有看似壁垒森严的罗网，迈向了一个民主自由新时代：从年初的波罗的海三国，到春夏的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到初冬的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直至一个完美的句号：1989年12月9日柏林墙被人民力量挤垮。整个过程如同某位剧作大师的作品一样既高潮迭起，激动人心，又有序曲与尾声。

对于无法走出斯大林主义阴影的一部分共产党人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恶梦，而对于接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另一部分共产党人而言，这是他们努力争得的逻辑结局。

从西方观点来看，这是共产主义大厦轰然倒塌的戏剧性一年，似乎是单方面的胜利。然而换一个视角来观察，难道这不是人类史上罕见的一个和解之年吗？难道不是全人类的胜利吗？

该年二月，匈牙利开放党禁；四月，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选入议会；六月，波兰团结工会不仅被解禁，而且以选票击败波共开始执政，波共领袖雅鲁泽尔斯基与之握手言和；同月，戈尔巴乔夫预言柏林墙有一日会不复存在；八月，尼加拉瓜亲美叛军解散，为次年民主选举铺平了道路；九月，匈牙利向西方开放边界；十月东德被迫顺应变革；十一月，杜布切克回到捷克政坛，同月10日，柏林墙的大门打开了。在阵营的另一方，南非，和解之风从另一个方向刮来：新任总统德克勒克在十月无条件释放了六位非国大领导人，十一月开始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一系列动作直接导向次年二月释放曼德拉与全面的和解。

1989年的12月伊始，“和解”出现在一个接一个的日子里。12月1日，戈尔巴乔夫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面，两大敌对阵营的领袖成为朋友；12月2日，马来西亚政府、泰国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

同意销毁武器及解散武装部队，宣告马共四十一年来的武装斗争结束；12月3日，美苏在马耳他沿岸的一艘船上举行了首脑会晤，会晤后，苏方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宣布：“冷战于今天12时45分结束。”

马共的结束武装斗争进程，与苏美和解的过程完全没有因果关系，所以12月3日“冷战结束”正好紧随于前一日的合艾和约签署，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一个历史注脚。马来亚共产党似乎比一切历史进程总是慢好几个节拍，以至它失去了所有的出头的机会，却在这共产主义大退潮的最后关头，恰好赶上了这最后的一步。该悲还是该喜？

那么。难道成功地镇压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与百姓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拒绝和解的共产党？

不对啊！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吉米·卡特总统的牧场上戴上牛仔帽的那时，它就已开始了与西方阵营的和解进程。

马共与马、泰政府的和解，与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大，却与邓小平的新政息息相关。

追溯历史之四

马共其实是尝试与它的敌人和解的先驱。早在1955年，当它看到英国政府有撤退的意图，而胜出大选有望坐收独立之果的马统（一译巫统）领袖东姑·拉赫曼摇动橄榄枝之时，便决定与之和谈。在英方安排下，代表马、新政府的东姑、马绍尔及陈帧禄与代表马共的陈平、拉昔迈丁和陈田，在一个叫华玲的乡村小学校舍举行轰动马来亚的会谈。被舆论宣传描述成恐怖头目的陈平，第一次在媒体亮相。有一家报道甚至用了“玉树临风”来形容这个31岁的共产党总书记的风采。只有与他在抗日时期共事的昔日战友、今日敌人，前136部队英国军官戴维斯才细心地发现发胖的陈平其实是缺乏营养的浮肿。戴维斯知道陈平向来与部下同甘共苦。

华玲会谈以失败告终。因为马共游击队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没有任何筹码。它只要求有尊严的结束武装斗争，而不是投降。但东姑决不退让，一定要陈平投降。东姑的强硬固然因为握有英方许诺给他以独立的底牌。但他有一句话透露出内心深处的恐惧：“蒋介石还有一个台湾岛可去，将来你们把我赶出马来亚，我可无处藏身。”东姑对共产党的认识不可说不深。不过历史千变万化。陈平显然不是毛泽东。何况马来亚还有独特的民族结构。

东姑的强硬掀开了马来亚把马共排除而走向独立的篇章。马共则求仁得仁，宁死不屈，被压缩到泰南边界的大山之中。

话说陈平于1961年经越南赴北京途中，痛苦地发现正当他的党决定放下武器，改走政治斗争之途时，他的越共同志正斗志高昂地决定南下十七度线，发动解

放南越的武装斗争。而整个国际冷战局势，也把两大国际阵营双方推入局部热战的尖锐对抗状态。

1961年7月陈平等马共在北京领导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正式会谈时，邓力劝马共必须善用这个即将席卷全东南亚的时机，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陈平后来回忆说：“我在一瞬间震惊了。”因为他与马共政治局经历好几个月的检讨，才痛苦地认识到：“我党生存的仅存的希望就是回到政治斗争。”现在，在中共许诺给予财政援助之后，马共政治局多数成员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陈平不得不服从多数。于是，一场注定不能成功的武装斗争再度展开。至1989年，它又延长了整整28年。其间经历了1969年马来西亚马、华民族冲突引发的新一轮扩大力量时期，以及肃反扩大化的自杀性政策造成的内部分裂。到1970年代末期，它仍回到只能局限于泰南边境基地自保的状态。

而在中国，其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天翻地覆的动乱与变化。到1979年邓小平成为中共最高决策人时，中共的策略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980年12月，邓小平约见陈平，要求陈平关闭设在湖南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此举为了交换东盟四国在联合国支持红色高棉席位，那是李光耀访华时提出的条件。从1981年开始，邓小平就鼓励陈平“寻求和平方案”，陈平并回忆说：“这是中国向世界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后，联络部向我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的武装斗争的经援不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事实上，从此中国对我们的经援已有计划地递减。”

陈平回忆道：“我早已密切注意北京与吉隆坡关系的发展。……邓小平1978年访问吉隆坡时宣称，从今以后，中国把她与马共的关系视为历史的事实——必须搁置一旁。”

如此，和谈之门再度打开了一条缝。

历史似乎与马共开了一个大玩笑。几十年的艰难困苦，一切重归原点。马共依然局限于国境大门之外的深山里，看不见任何政治前途。唯一的变化是陈平从青年成为老者，而他的战友，大部分已经战死。然而另一个变化是他的对手也换了一个世代。马来西亚的现任首相是马哈迪尔医生。他不是另一个东姑。通过内安法令，他已紧握权柄，不再把共产党作为首要敌人。头号敌人被宣布是“毒品”。

和谈开始了。时在1988年。

约会历史之二

今年9月中旬，就在我与合作者同龄朋友王旭准备前往马来西亚作初次访问的几天之前，远在欧洲的叶先生通过在怡保的秘书转告我与一位作家伊恩·沃德联系。伊恩与夫人诺玛是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的执笔者与出版人，此时他们正在悉尼的家中。伊恩与诺玛会安排我们陈平的会面。接信后我与王旭、王兰立即前往拜会这对夫妇。

我们受到热情接待。不过在热情的背后我也觉察到某种友好形式的“政治审查”。我很快意识到陈平希望通过他们来确定我们是什么人以及什么意图。因为叶先生毕竟不是他的密友且属于另一个阵营。我们坦诚相告并很快得到了伊恩与诺玛的信任。

伊恩与诺玛本身也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伊恩留着马克思一般的大胡子与长发，须发皆白，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有剑一般的浓眉与尖锐的目光。他一开始便宣布他不仅不是马克思的信徒，而且“属于右翼”。因为他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工作长达 25 年，职务是该报驻东南亚首席战地记者，见证并报道了整个马来亚紧急状态与越南战争的经过。直至退休后，他一心想要了解当初属于他无法采访的敌对一方的真相，便寻找到了隐居泰南的陈平并说服陈平合作来撰写回忆录。这项合作持续长达数年。陈平口述的录音长达数百小时。他与诺玛又安排陈平到伦敦、堪培拉等地查阅英文档案，使陈平也了解到自己交战对方的内幕。这项合作的终点，便是用英文、中文同时出版的几十万字数的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该书由这对夫妇设在新加坡的出版社出版。

诺玛与剑拔弩张外貌的丈夫不同。温文尔雅的圆脸，是一位亚洲脸型的菲律宾知识女性。她连半点“右翼”也沾不上边。她甚至不能接受我们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我不知道是与陈平的非同寻常的深入交往而改变了这对夫妇的政治观点，还是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典型的秉持正义良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陈平是“铁哥们”。我们能否会见陈平，就取决于他们的首肯。果然，后来伊恩告诉我，陈平本来犹豫不想见我们了，结果伊恩说服了他。在短暂的“政审”结束后，伊恩立即拨通了国际长途，并招呼我去与陈平直接通话。

我几乎不知所措。在用英语问候并简单介绍我自己之后，陈平建议我们用普通话交谈。他的普通话相当流利，那一定是他在中国时学会的。后来我知道他在语言方面的才能。他在森林里学会了马来语，还能讲泰语，加上英语与福建话、广东话，他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人交谈。

陈平在听我自我介绍了中国大陆背景后，便开玩笑说：“你一定听了不少关于我的坏话了吧？因为我与一位中国的大人物经常吵架。”事实是，无论好话坏话，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一概听不到。中共与“兄弟党”之间的事务，被视为高层机密。尤其在马共从政治棋盘上被撤下来之后，连正面报导也只字不见了。

电话里我们约定在曼谷见面。伊恩提到一个饭店的名字“东方饭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家老牌的顶级饭店。会面将安排在那里。

咀嚼历史之一

东姑把华玲会谈失败归咎于陈平对他说的一句让他冷透心的话：“在你我之间，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友情，因为你不是共产党员，而我却是个共产党死忠派。”他说这句话让他认清了共产党。如果说果真如此，那么似乎陈平作为谈判对手过于幼稚了。我设想换了周恩来他一定不会那么说。更何况东姑作为马来民族的领袖，按照共产党的政策，至少是团结对象。但是今日史家也常批评周恩来的过于圆滑。他争取到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盟友，到1949年后被毛泽东整肃得所剩无几。而陈平的这番话，倒是胸襟坦诚，丑话说在前面。

其实，果真陈平与非共产党人，甚至反共营垒里的个别人，没有建立真正的友情吗？看来并非如此。他与伊恩夫妇的友情，便已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而另一个让我感动的例子，是他与英国军官戴维斯的友情。

约翰·戴维斯是136部队时期陈平的盟友，两人在丛林营地的日日夜夜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英文里这种关系是“Comrade”即中文的“同志”（虽然中文里限于意识形态一致的战友）。从1948年起，两人分属血腥厮杀的两个阵营。1955年华玲会谈时，英方为确保陈平的安全，或者为了换取陈平的合作，而特意招戴维斯作“陪同官”。在两日的会谈结束之后，戴维斯护送陈平一行到森林边缘宿营。他问陈平，能否与陈平一同过夜。陈平在回忆录里记述这次“sleeping with enemy”（与敌共眠）的场景：

“我当然不反对。我一向喜欢戴维斯；事实上，我欣赏他。我们可以谈过去的好日子，至少那时大家站在同一个阵线。

“在我们交谈时，夕阳西下。我坐在一件披风上，交叉着腿。戴维斯躺在另一件披风上。在我们周围，森林的昆虫开始鸣叫。（嘉蔚注：一幅油画的完美构图）

“我们交谈到深夜。这好象是日本占领时代的时光倒流。我们吃英国人的军粮，喝热咖啡，咖啡是我的警卫员在露天生火煮的。我打听在战时我共事过和帮助过的英国情报人员的下落。他问起他认识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的情况。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在做些什么？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我问起的英国情报人员大部分还活着，生活过得不错。戴维斯提到的我的同志大部分在紧急状态期间死了。

“这是非常友好的交谈，虽则我一直觉得，戴维斯是高傲独特的人。不过，他勇敢和充满活力；很适合担任战争期间他在马来亚所做的特别危险的工作。对他现在所做的事也很合适。”

戴维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述道：

“第二天早晨，天一放亮，我们就送他回丛林边缘，那里已经有英军布防，我说：‘瞧，让我陪你进入丛林走一段，直到你觉得没人会向你背后开枪为止。’于是我们进入丛林，与他和他的游击队员走了大约两、三百码——真是太好了，就象过去与他在一起时那样。他停来说，‘好，非常感谢你，已经

够了，我们现在就走。我派两人送你回去。’我于是对他说：‘你并不认为在咱们自己的丛林我还需要护送，对吧？’他大笑着说：‘不，一点也不，我想是不需要。’我们握了手，非常友好。我转身走回，晃悠到营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约会历史之三

当笔者于9月19日深夜通过伊媒儿与诺玛最后敲定会见陈平的细节之时，却想不到坦克正在开往曼谷的街头。一场政变发生了。会见还会进行吗？怀着不安的心情，我与王旭在次日登上飞往吉隆坡的航班。抵达大马的次晨，叶先生安排了他的朋友、老同学陈汉强先生来陪我们参观与采访。陈先生还约了两位华社的知识界人士来相见。一天下来，我们不仅接受了大量的资讯，而且从华文书店捧回了一大摞历史书籍。

出乎我们意外，书店里公开出售包括陈平自传在内的大量马共历史回顾书籍，也有公开讨论马来西亚政治现实的书籍。这标示马来西亚当今的言论出版自由尺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让我感慨的是，在长达数十年禁止谈论马来亚共产党历史之后，一旦开禁，马来西亚知识界正热衷于重新探讨与评价马共的历史功过以及事实真相，而且出于一种逆反，讨论多倾向肯定与同情马共的奋斗。这种情况恰好与在中国相反。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讨论尺度逐年放宽，使中国知识界热衷于重新挖掘与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史及其历史功过，同样出于逆反，普遍重新肯定国民党在抗战以及其它历史时期的贡献。

叶先生的秘书通知我们，约会陈平按原计划进行。于是我们抓紧一切时间阅读陈平与马共成员回忆录，以免到时不得要领。

在吉隆坡的第三日，陈先生带我们去拜访一个与马共历史有关的人物：前大马警察政治部副主任姚光耀先生。陈先生与姚先生也是老同学，怡保人。他俩都是曾在大马警界从事一辈子文职工作的退休公务员，年逾七旬。

姚光耀在陈平自传里被提及，称之为“经验特别丰富的华族官员”。他是1989年合艾和约的幕后推手之一。功不可没。与年纪相仿的陈先生相比，姚先生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我们共进晚餐。席间我说到陈平，姚先生停了筷子，郑重其事地说了五个字：

“陈平，真君子！”

回到住处，姚先生向我们细述当年和谈的经过。作为以反共为首要任务的政治部高级警官，他积多年经验认定，马共每次被击败退入深山，在它复出下山时都比以往更强大。所以打不是一个最终解决办法，最好是和谈。他与上司政治部总监拉欣诺就此取得共识。拉欣诺后来回忆说：“马共的斗争的确是失败了，但是他们的人还是继续存在，这是政府必须接受的事。”他们向首相马哈迪尔汇报了这种思路，得到了明确支持。

姚先生被派往泰南泰军司令部协调此事。他们安排为马共高级干部到吉隆坡的医院秘密治病，把和解的信息传递给马共方面。为了在更高层级上以及与中共方面展开协商，姚先生找到了香格里拉集团总裁郭鹤年作为沟通管道。不久以后，在香港香格里拉饭店举办的一个大型宴会上，姚光耀被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会见一位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官员，之后，陈平从北京指派马共政治局女委员阿焰代表他与姚光耀见面，会谈就此开始。

数月之后，在泰国普吉岛马、泰、马共三方已举行了四轮会谈，几乎已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希望在 1989 年 12 月 5 日国王诞辰之前签署和约，以作为生日献礼。但在最后关头在武器问题上卡住了。此时陈平已抵达普吉岛，他与拉欣诺关门密谈。一切问题迎刃而解。12 月 2 日和平协议签字生效。

此后，陈平邀请姚光耀作为唯一的马来西亚政府代表前往马共在泰南的根据地参观。姚光耀出示他此行的几大本相册。看到照片立即让我想到了 1937 年国民党代表团在张冲率领下首次访问陕北红军区域。张冲与周恩来在谈判中成为了互信的好朋友。张冲当时是军统高级特工人员，职务与地位与姚光耀相似。张冲后来病故时周恩来甚为感伤。

与 1937 年照片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全是彩色的。以至看到照片中头戴红星军帽的战士，几乎以为是电影里的镜头。那些持枪训练的女战士分队，活脱的红色娘子军，教我难以相信那是在 1989 年的当今时代。

姚光耀惊异于马共仍有这么多的青年战士。这一发现证实了他早先的担忧。他也惊异于营地的井然有序并且还有医务人员，包括一名牙医。那位牙医为他检查了牙齿。他被邀观看战士业余演出。看到有那么多漂亮姑娘，他说他有点乐不思蜀了。

后来，陈平兑现了所有他在签订和约时的诺言。这是为什么姚光耀如此欣赏这位对手。姚光耀说：“马来亚共产党可能还存在，那有什么关系？那是他们的事！关键是和平了，不再打仗了，不再死人了！”

但是马来西亚政府迄今不允许陈平回国，那怕只是返乡扫墓。就在我们访马时期，陈平诉诸法庭要求返乡的案子还在审理与拖延之中。姚光耀说，由于当时签约的政府代表均已退休，换了一拨人，这官司很难打成功。

不过后来当我们回悉尼再见到伊恩夫妇时，他们批评姚光耀作为证人，不愿意站出来为陈平说话，因为怕开罪政府，影响到他的退休待遇。

我不知道这一指责对姚先生是否公平。但是他一定有他的难处。

无论如何，凭 1989 年的成就，姚光耀有理由自豪。他与参与其事的三方人员一道，干了一件“胜造七级浮屠”的大事。

2006年9月24日清晨，我与王旭飞往曼谷。叶先生的一位朋友阿比扎开车接我们直达位于曼谷市区的东方饭店。饭店的新楼与曾是东印度公司的旧楼相连，俯瞰湄南河与一座天主教堂。叶先生在12楼订了三个房间。我们在其中一间安顿好后，阿比扎即带我们到隔壁房间敲门。

门开处，一位温和的老者，身着马来特色有着复杂花纹的缎子长袖衬衫，用普通话与我们招呼。这就是陈平！那个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即使在今日，也带有许多神秘色彩的陈平。由于我几日来见到了许多他的照片，所以已经不觉陌生了。相对而言，我们对于他倒是陌生人。

我们请他坐下。他介绍他的服务员小李与我们相识。小李，李国坚，广州人，昨天才从香港赶来，接替前一位服务员来照料陈平。后来伊恩说，李可能是某位陈平战友的后代。以往半个世纪里，有许多马共成员——他们多半是华人——的子女是在中国接受教育与长大的。他们对陈平忠心耿耿。陈平也的确需要身边有人。除去他已是82岁高龄长者之外，并不排除仍有被暗杀的可能。

<http://www.jintian.net/today/html/00/n-1800.html>

最后的共产党人（下）

发布：2008-8-29 09:28 | 作者：嘉蔚

约会历史之四

2006年9月24日清晨，我与王旭飞往曼谷。叶先生的一位朋友阿比扎开车接我们直达位于曼谷市区的东方饭店。饭店的新楼与曾是东印度公司的旧楼相连，俯瞰湄南河与一座天主教堂。叶先生在12楼订了三个房间。我们在其中一间安顿好后，阿比扎即带我们到隔壁房间敲门。

门开处，一位温和的老者，身着马来特色有着复杂花纹的缎子长袖衬衫，用普通话与我们招呼。这就是陈平！那个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即使在今日，也带有许多神秘色彩的陈平。由于我几日来见到了许多他的照片，所以已经不觉陌生了。相对而言，我们对于他倒是陌生人。

我们请他坐下。他介绍他的服务员小李与我们相识。小李，李国坚，广州人，昨天才从香港赶来，接替前一位服务员来照料陈平。后来伊恩说，李可能是某位陈平战友的后代。以往半个世纪里，有许多马共成员——他们多半是华人——的子女是在中国接受教育与长大的。他们对陈平忠心耿耿。陈平也的确需要身边有人。除去他已是82岁高龄长者之外，并不排除仍有被暗杀的可能。我问陈平，应该怎么称呼您为好，他说，人们都叫我老总，“我一开始说，朱德、陈毅他们才合适叫老总，我不够格。他们说，如今时代变了，公司老板都叫老总，我一想那也是，所以就都叫我老总了。”

陈平当了快 60 年的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老”而且“总”。我们于是也称呼他“老总”，但又觉得别扭，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吧。我很快改称他“陈总”。

我们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因为“六、四”事件才退党的前中共党员。于是话题自然从“六.四”开始。陈平在自传里明确表示，他对天安门事件之后的邓小平领导是肯定的。陈平没有与我们争论。他只说，他看见他住的复兴路一带，高楼上方的墙与窗有许多弹孔，说明部队是朝天开枪的。王旭说他当时也在北京，就在复兴门一带有些老年离休干部也被打死打伤了。陈平听了沉默不语。我说，其实中共中央失去了一个历史机遇。“六.四”的群众打了红旗，唱着国际歌，只是要求反贪腐，如果中央顺应民心，历史会改观。陈平听了点头。我们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因为是闲聊，又扯到了文革。陈平在自传里提到他曾“陷入文革的政治泥沼”，在 1969 年还要致力于从中摆脱出来。可惜当时我还未及读到那句话，所以没有问他当时的具体经历。但是陈平说了一句对刘少奇的批评。他说刘不该派王光美去搞四清并树为样板。我理解陈平是指高层领袖的妻子不应被委以重任。陈平在这方面是持相反态度的。他的妻子（他们夫妇均从一而终）是老资格战友，但一直从事非常基层的工作，如抚养教育马共在华人员子女。我说刘少奇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第一次被捕，即落入赵恒惕之手时，他的一位党外朋友是老同学，四处奔走终于将他营救出狱。但是镇反时期那位救命恩人被作为恶霸地主被当地公安局逮捕。他以救过刘要求宽大处理。公安局专函刘少奇核实，刘彻底否认此事，其同学遂被处决。作为一个第二号领袖，他完全可以以德报恩。陈平静静地听了。这时小李也加入讨论。小李说 1976 年“粉碎四人帮”时中共中央说文革使中国经济面临崩溃，好象有点言过其实，另外现在的中国宪法不如中共十大时的宪法，因为当时的宪法还允许工人罢工。我说那只是写在纸面上的。真的去罢工试试！我说其实 1975 年工人不罢工，而是大规模怠工。我有一位女同学，在她工作的棉纺厂里，全部工人都上班也领工资，但是不工作。全厂只有她一台机器是开动的。

我们好象在很多政治、历史话题上相左，但却一样洋溢在一种同志般的友好气氛中。边说，边下楼去吃午饭。我们这时才发现小李也不小，看着年轻，其实也过五十了。

午饭之后陈平需要小睡一会。我与王旭利用这段时间去皇宫广场一带观看政变现场。只见如同嘉年华会一般热闹。脸孔黝黑的士兵很乐意与民众合影。政变乃泰国政治的家常便饭。而与本次政变相关话题之一正是与马共息息相关的泰南分离主义叛乱。就在我们见陈平的这些日子里，合艾便发生攻击平民的爆炸。泰南反政府或者割据势力以前有马共、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与土匪。马共在时最强大，压制了另外两股势力。由于马共奉行“客居”政策，不扰民，对泰军只作自卫还击，所以受到当地百姓欢迎。马共解甲归田之后，另两股势力便日渐猖厥。

下午 3 点叶先生自欧洲赶回抵饭店，与我们一同再去陈平房间拜见。陈平正式地问叶先生这次计划如何，我们细说了关于马来西亚历史画的构想，并且认为

马共反日本占领与反殖民主义的贡献是不应被忽视的组成部分。叶先生问陈平，你认为马共方面应该画上什么人？

陈平认真地想了想答道：“四个人，两个马来人，两个华人。要把杨果画上。”

他没有说另外两个名字。不过我非常清楚，马来人领袖一定是与他参加两次和谈的拉昔迈丁，以及党主席和马来族第十支队创建人阿都拉西地。

在陈平自传里有杨果中学毕业时的照片，一张英俊正直的脸。他与陈平年龄相仿。两人共同揭发了前总书记莱特的真实面目。杨果在五十年代末牺牲。

陈平说完杨果的名字后，沉默了好一会，看着窗外，忽然离开了刚才的话题，说道：

“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到丛林（Jungle）里去。”与叶先生对话时，陈平的普通话夹用英语。

我们都明白这句如同遗嘱般沉重的话背后所包含的全部意思。我们都用沉默来表示尊重，承诺和理解。

下午的主要安排是为陈平画头象写生与拍照。我画了一张正面的。王旭画了一些不同角度的速写。

陈平年轻时，直至 22 岁受勋与蒙巴顿勋爵握手时的照片上，还是一张娃娃脸。中年开始发胖。现在我所面对时，已是真正的老年人了。不仅几乎秃顶，年轻时的浓眉，也已稀疏花白。眼睛总是温和地藏着眼睑后面。可是他的思维与反应能力显然完全没有退化。后来我检视拍下的他的照片，当他与对谈者讨论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他顿时目光炯炯，黑眼珠一下子似乎要夺眶而出。

我问陈平，为什么马共军队的帽子是五个角的。因为明显地他们在模仿中国红军，但却不是八个角。陈平笑笑说，抗战初起时，来了一位东江纵队的中国同志，帽子的式样，敬礼的姿势，全是他按照东江纵队的模式照搬过来的。这倒让我长了见识。以后要去查查东江纵队的服式。马共虽然学中共，但抗日时，帽子上正中前方不是一颗，而是三颗红星，代表马、华、印三大马来亚民族。后来莱特又在前方左、右两角及上衣领上加了四颗星（从照片看大约是黄圆底红星），在帽沿上方加一黄色帽带。而从抗英战事起五角帽上只剩了一颗红星。

马共的敬礼是用拳头举至平眉。这是标准的全球左派敬礼。源自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的人民阵线时期(或更早). 当时无论共和军，共产党的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还是国际纵队的英美自由主义者，全部互致这样的敬礼。当西班牙的志愿者来到中国抗日战场时，中国人第一次见识这种行礼方式。白求恩便如此敬礼。我不知是否因此地处广东的东江纵队得风气之先，而又带到了南洋。时

至今日，远在非洲南端的南非国大党（一定也包括共产党等左翼盟友）也如此敬礼。随了曼德拉的出狱，这种敬礼有了新的生命力。它代表一种永远的理想主义激情，使我一直钟情于它。我告诉陈平这一敬礼的来源，他似乎是第一次听说。但也许他早已清楚，只是任我班门弄斧罢了。

咀嚼历史之二

马共与中共的历史渊源，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浓缩到两位领袖人物身上，亦是这份复杂情怀。我发现陈平每提起邓小平，都是这种复杂的心情。1962年在马共决定停止武装斗争，转入政治斗争时，是邓小平代表中共要求马共重新拿起武器；1981年马共决心坚持武装斗争时，又是邓小平要求他们收盘。是谓战亦小平，和亦小平。其实此小平非彼小平也！前一位小平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传声筒。后一位小平才是他自己。君不见毛泽东在1966年批“刘邓路线”不正是“三和一少”吗？“和”者，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解，“少”者，即对革命运动支援要少。这一点陈平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对毛泽东的错误都早已看在眼里，例如一到中国看见大饥荒时，他便认为大跃进是一个大灾难。但是由于毛泽东对马共的大量财政支援，他与马共一直心怀感激。我一直没有听到他对毛有不敬之词。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东南亚的外交思路截然相反：一个支持当地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推翻那里的现有政府，另一个要当地共产党放下武器，谈判和解，而且靠边站，不要妨碍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建立密切政经关系。从陈平本人在《我方的历史》中陈述的思路来看，他一直是马共中央的“主和派”，其实与邓小平有类似的务实精神；但马共在后来的28年里，长期得到中共的财政资助与相当于大后方的有形及无形的支持，而这一援助始自毛泽东的指示。此外毛泽东作为军事策略家与游击大师一直是陈平们精神上的导师，因此陈平内心对毛是尊敬与感激的。反而邓小平终止了这种资助政策，作为马共领袖，陈平当然不会高兴。然而我想陈平在这么多年的思考中，不会不认识到当年毛指示要他们恢复武装斗争其实是害了他的党。因此在我读陈平的书，听陈平讲话时，一直感到陈平存有某种程度的自相矛盾。在他内心似乎有两个不同的陈平在轮流坐庄。他不满邓小平对马共的态度，又不得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不满毛泽东在1961年的指示，又感激毛对马共的支持。唯有对邓小平在1989年的镇压，这种与毛泽东一脉相承的铁腕措施，他予以认可，没有表示谴责。而且对邓小平在“六四”之后的作为，评论道：“我相信今天的中国走对了方向。”他解读这是因为此“乃硕果仅存的共产主义形式。”但是事实上，共产主义只是“硕果仅存”的旗号而已。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不归路。只是在镇压反对派时，才使用了共产党的专政方式。对此陈平或者是不愿意去直面。因为对一个奉献一生给共产主义事业的老战士而言，事实太让人痛心。但在我心里猜想，作为一个党总书记，在他写书时有不少话也是不能直接说的。从他对波尔波特的在柬埔寨所作所为的反应，从他关注柬埔寨华人同胞恐惧与他说话等记载看，他对“六四”镇压的看法其实并未说出来。我一直很后悔没有与他深入地讨论文革，尤其在后来读到他曾“深陷文革泥沼”时。他一定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体会。但以我们这样两天的浅浅交往，就是我问他，他也未必肯说。

马共与中共的特殊关系，还在于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以及占绝对多数的追随者都是华族，与中国人同文同种。这种血缘关系无疑对马共中央在中苏两党决裂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中共一边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一边倒”的决策将它与在“文革”前后愈演愈烈的中共“极左”路线及毛泽东一心要充当第三世界革命导师的勃勃野心捆绑在一起，使它沦为中共在东南亚外交政策的一枚棋子。“战”时是马前卒，“和”时撤出棋盘，毫无自主的可能。所以它的悲剧性命运，几乎不可避免。

其最荒唐的例子，无过于 1979 年必须跟随中共声讨越共“地区霸权主义”。如陈平回忆，马共在 1961 年恢复武装斗争，是要借越共南下发起解放战争的东风。在 1975 年越、柬、老三国共产党分别胜利并掌权之际，西方阵营惊恐万状，“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挥之不去的恶梦。不料“其实真正发生骨牌效应的，是‘主义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内讧：苏共打中共，中共打越共，越共打柬共。”（朱学勤：《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时且不谈中、越、柬·的问题。从马共这个弱小政治单元的利益来分析，无论历史渊源还是现实考量，它都宜与中、越、柬、苏几方保持等距的友好关系，如同当年越南同时得中、苏两方援助而致胜一般。从地理角度讲，越南是最可借的力量，然而马共站在中、柬方面，宣布越共是它的首位敌人，“号召全马各族人民要准备随时动员起来‘反侵略’”“马泰边区的抗英民族解放军立即呼应号召，迅速作出越南一旦南下入侵即予以还击的准备。”并进而自认为“站在反抗入侵和保卫祖国的最前线。”（方山：〈见证和解与回马〉）

然而与此同时，它本身不仅被马来西亚政府军赶出国境，而且正处于被马军空前规模大围剿的困境中。真是极大讽刺。

马共这一站队得到中共的回报是什么呢？是它设在湖南的广播电台被要求撤出中国。

至此在东南亚于越战之后新一轮大博弈中，马共已被逼至绝境。

当然这一分析是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马共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如前所述，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视角来看，马共在绝境中找到和解的出口，是值得庆贺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虽然从马共本身而言，和解之后，它在政治上也等于结束了生命，是一种“自杀”的行为。但这种“牺牲小我”换取了地区和平与发展，符合陈平们早年拿起武器为之奋斗的初衷。陈平可以感到安慰的是，如果马共在 1948 年没有揭竿而起，马来亚的独立肯定不会在 1957 年便早早成功。这一个结论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约会历史之五

在我们会面的当晚，叶先生请大家到饭店临江的露天自助餐厅用晚餐。叶先生与陈平用英语交谈甚欢。小李与王旭和我谈论共产主义的问题所在。席间小李谈起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部纪录片《最后的共产党人》及其被禁映的事，陈平也知道并显然看过它的 DVD。这个话题是与与陈平被禁回马相关的。今晨我们在

飞离吉隆坡时的飞机上正好读到当日中文报纸报道了陈平申请回马案，法官因故不能开庭而延期。我谈到这条新闻，陈平无奈地笑笑说，他们只能用这种借口来回避拖延。

第二天早晨，大家再在早餐桌上相聚，阿比扎也赶来参加了。昨日的相聚与畅谈，进一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我说到自己属鼠时，陈平对我说：“我也是一只老鼠。”于是我想起他是出生在1924年，比我大整整两轮。谈话又回到陈信仰上。阿比扎问陈平：“你现在还相信共产主义吗？”陈平答道：“我们看不到了，但是我相信在很远很远的将来，会有这样的社会到来，那时会有新人产生。”我略为惊异，因为就在昨晚与小李谈话时就对小李说了我对“共产主义新人”不可能出现的认识，那时陈平正与叶先生在笑谈，不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而今天他谈到了同一个话题，而且仍然相信“新人”的可能性。不过当把这种希望推至无限远时，我与他针锋相对的看法似乎也趋同了。虽然我对于人性恶已经不抱任何变更它的奢望，但是谁不希望人类会最终变得彻底的善呢？何况陈平与我们一样已经不相信并完全放弃使用强迫与暴力的方式去创造“新人”。小李在昨晚听了我的政见后说：“我明白了，你们是社会党。”在陈平青年时代，在共产党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行动中，社会党是敌人的同义词。而今天，陈平的政见其实与社会党没有什么区别了。尽管小李还是惯性地视自己是最后的共产党人。

早饭之后又是三个小时的写生。这次我画了一幅正侧的头象。陈平一直注视着落地窗外的湄南河。在我想象中，他是在遥望泰南连着他故乡的大山。

小李对陈平照料备至，休息时拿出坚果给他吃，并嘱他按时服药。他有高血压与痛风。我对陈平谈起伍连德，说到这位出生于槟榔嶼、晚年在怡保行医的医生在中国大陆更为有名。他扑灭了1910年东北肺鼠疫，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者。陈平歉意地笑了笑说：“抗日战争时，我手下的人绑架了他。”看我吃惊的表情，他解释说，“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在中国的贡献，只是看他对穷人比较傲慢，就绑了他要他出钱资助抗战。他拿钱出来后，我们的人便放了他。

后来我从伍连德传记中也读到这段故事。有意思的是，马共游击队放了伍连德后，他又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控以通共的罪名，幸得也是他病人的宪兵队上司信任，释放他回家。

伍连德于1937年回马来亚。中国大陆在后来几十年里几乎忘记了这位大恩大德的医生。至少到1989年以前，他的姓名无人提及。因此陈平似乎也一直不清楚伍连德的政绩。我简略介绍之后，他感慨不已。

习作画完之后，我把昨日画的那幅赠给陈平。然后取出三本陈平的自传中文版请他签名，其中一本是给国内一位朋友。他均以“同志”相称。如给我的那本是“沈嘉蔚同志留念”

我又请他为《青山不老》一书签名。这一本客观地报导马共历史，由星洲日报社出版的书，是请我在国内的朋友，自由主义思想家朱学勤写的序。陈平也写道：

“朱学勤同志留念”

陈平读过这本书。他签毕后，翻阅此书，很认真地要找一句他曾在里面读过的话，但差不多十分钟后还是找不到。小李问他是那一句，他说了之后小李很快找到了。那是警察总长拉欣诺说的话，书上原文为：

“英政府时代建立的情报组织，是成功击败马共的另一项利器。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最杰出的情报组织之一。”

我翻到书中所附照片，照片上陈平身着军服与阿都拉西地和应敏欽两位老同志合影。陈平与阿都拉头戴的不是五角帽而是船型帽。我有些不解。陈平回答说：

“马来同志的第十支队不喜欢五角帽，想要不同的帽子，我就说，你们自己去设计吧。他们就搞了这个船型帽。”

我趁机问他：“你的帽子还在吗？能不能送给我一顶？”陈平说：“我的帽子不知藏到哪里去了。不过我会让他们寄一顶给你。”

12 点半，我们一同下楼去餐厅午餐。叶先生包下了饭店最豪华的贵宾厅，一张巨大的长桌，两边各有四座。厅外是大自助式餐厅。叶先生宣布实施共产主义进食法，由他与阿比扎两人出去拣菜回来分而食之。他解释原因是发现昨晚自助餐不少人没有注意享受美食。这次他要推荐所有好东西让大家一嚐。午餐吃了两个多小时。美食自然是顶级资本主义水准的。鹅肝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品嚐。

上甜食之前，叶先生的老朋友，东方饭店贵宾接待室的安卡尼亚夫人加入进来。她被安排在陈平的左手座位。她自我介绍她的专业是对付所有难对付的贵宾，已在这里整整工作了 60 年！她问陈平多大年纪，陈平答：“82 岁”她便说，你是小弟弟，我长你两岁。很快我发现这位老太太是个大活宝，活脱的单口相声大师，不过是用纯正、不带马来口音的英语。

叶先生向老太太介绍，说陈平是共产党。老太太接口便道：“No one is perfect（无人十全十美），每人都有好坏两面，要看什么时间。时间也许会很长。但从前不吃香的，后来成了宝贝。”她说自己活得太久，深有体会。然后又说：

“我年青时要去丛林玩，有人说，那里既有鳄鱼也有共产党，你宁愿遇到哪一个呢？”说完看看陈平。

陈平开怀大笑。笑声中老太太用法语说了一句什么，其中“革命”一词说得美妙无比，“莱伐露茜昂——”

叶先生也接着来恭维共产党：“一个好领导人要有资本家的头脑和社会主义者的心肠。”陈平听了大乐不止。

我问陈平：“中共在延安时男女比例是八比一，马共在丛林里的男女比例是多少呢？”

陈平认真地想想说，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吧。再问到婚姻制度，他答只要有男女相爱，报告组织批准，便可以结婚。不过不是每天可以同房。

3点钟时，告别的时刻来临。陈平说他是住在曼谷郊区的一处房子里，是由一位富有的支持者提供的。

在楼下大堂大家握手道别。陈平戴上了一顶软沿遮阳圆帽。见我好奇的表情，他说，这是一位日本友人送的。于是又引出他一段故事。他说1945年光复时，他被派到太平市接收，负责处理日军遣返。当时日军宪兵总部已从新加坡移驻太平。宪兵司令很合作，甚至提议共同抗击英军，幸未发生。其间日本宪兵们认为他够朋友。有一人在几十年后还回来找他，现在曼谷经商。这顶帽子就是他给的。

虽然仅只相处不足两日，与这位父辈老人分手，心中不禁有些伤感。

这是我见过的最不象“共产党”的共产党人。

这是我见过的最真诚与执着的共产党人。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最后一个。

咀嚼历史之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4日后，3月9日上午我，一个5岁中国男孩由母亲陪送去幼儿园，刚进门汽笛声响彻全城，我与母亲，以及周围所有的大人、小孩全体立正垂首，向斯大林致哀。此刻全球的共产党人及其治下的人民均同样立正致哀，只有29岁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与他的部属例外。他们正遭受澳大利亚皇家空军70架次、3小时之久的猛烈轰炸。他的两名警卫阵亡。如果不是因为澳洲空军误认了目标，夷平了山谷的另一侧，那么马共的历史将改写。

这一个细节除了说明我与陈平同属一个阵营外，它还包含了更多的意义。它明确地划分了两代人。我生长在没有斯大林（而被毛泽东取代）的时代；而陈平是一个在斯大林旗帜下已经战斗了15年的老资格战士。我几乎从生命开始，便生活在共产党经过许多年残酷征战后建立起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们称

之为“极权主义制度”）社会里；而陈平终其一生，都挣扎在他的敌人统治的世界里，从未品尝到掌权的滋味（不过奇特地见证了我生活其中的那个由他同族却异国的同志建立的社会，长达 28 年之久）。最后，反讽地，陈平被迫选择定居泰国，而我已经自愿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而且，我们彼此都享受着只有这样制度的国家可以提供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

在与陈平共进晚餐并畅谈甚欢之时，叶先生忽然用英语问我：“那么你到底是一个共产党人呢还是反共分子呢？”我几乎没有迟疑便回答道：“我是共产党的儿子，但是我要反省父辈的信仰与作为。”

我的父母都是在 1950 年代中期入党的普通党员。但是我的回答的意思是强调我是在共产党意识形态哺育下长大的一代。在 1984 年整党会议上，我驳斥党支部内一些党员同行开口就是“党是我的母亲，母亲打孩子天经地义，是为了孩子好”的一派谬论，申明共产党只是由一群相同信仰的、互称同志的人集合而成的政治组织。组织与党员之间绝不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但今天我强调我与党的这一种关系，是讨论不同世代的共产党人的差别。而且我这一代共产党人（或者准确地说是前共产党人）恐怕已是生命形式的最后一代共产党人了。

共产党诞生时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新社会。无数的优秀青年，包括陈平，都是被这个目标吸引才加入这个运动以及组织。但是共产党（列宁党）从一开始便置自身于一个悖论之中：为了实施这一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它必须借助暴力革命血腥地建立起本身的政权，然后惯性地使用同样的暴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目标遥遥无期，甚至越来越虚无缥缈，而现实是几代人都生活在一个既有剥削、也有压迫、不自由不平等当然也不民主的社会里，在不同程度或不同方面，甚至比此前的社会还要差些。尤其是与此同时，采用非暴力方式的其他马克思信徒或者前马克思信徒（社会民主党人），却在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通过参与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式，实现了由早期掠夺型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比较均富的、消灭了绝对贫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两相对照，共产党人的社会实验被证明完全失败。少数没有被既得利益蒙蔽心智的、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包括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在 1989 年公开承认了这一社会实验的失败，并且解散了自己的组织，或者改组为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 1989 年结束。它对人类的贡献是“试错”。微观地说，我们可以也应该追究所有在此运动中犯下的罪行；而宏观地说，它是人类一次代价昂贵的实验，“试错”的结论可以让人类永远放弃这一类实验。

共产主义运动“试错”带给人类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在于它采用暴力作为实施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不过对此的反省与批判亦应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展开。共产党诞生于暴力的时代，而暴力不是共产党所首倡。促成共产党步入历史舞台的是带走了两千万生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一场大战的各方责任者，包括帝王、总统或总理，都不仅不是共产党，而且正是共产党的敌人。暴力远非共产党的专利，而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结束过的现象。甚至在几十个世纪里没有一个世纪没有战争。若说暴力属于野蛮，那末迄今最发达文明也依然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比如在伊拉克。第一代共产党人试图以国内革命结束世

界大战。他们成功地把自已的国家带入和平建设，但是暴力的惯性思维（如果不再加上如斯大林个人的邪恶品格）使他们继续杀戮自已的同志，以及无辜的农民；第二代共产党人，包括陈平，更是被迫直接夺取敌人的武器来反抗入侵的法西斯军队，以这种暴力反抗的正义行为开始了自已的共产党人生涯。我们后人没有半点权利来指责他们为正义与生存权利使用暴力。他们的奋斗开创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新格局。如果没有信仰共产主义的那一部分反法西斯力量的贡献（他们占了二次大战牺牲者的多数，仅苏联便牺牲了四千多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红军军人）至少欧洲的民主国家可能至今仍在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统治下，其中一定包括英国。

共产党的问题在于赶走外族侵略军之后，转而将暴力指向本民族的一部分人民，展开残酷的“阶级斗争”。从本质上讲，这与纳粹政权反犹的“种族清洗”是完全一样的。

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加上列宁式中央集权制必然导致的个人崇拜极权统治结构，便制造出了一连串的政治迫害与经济灾难。这种现象发生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明并非单纯源于最高领袖的个人品格。

从理论上讲，共产党希望在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里，创造出“共产主义新人”，从而建成那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比如在中国，贪官污吏如蝗虫般地生长出来，而他们都生长在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年代里，而且被作为党内精英挑选出来进入所谓的“干部队伍”。可见“新人”的理论彻底破产。

其实，少数终生抱持理想主义，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也即符合“新人”标准的人，在全人类任何发展阶段、任何形态社会里都可以找到的。早期的或未执政前的共产党人中，也不乏这样的人，包括陈平本人。但是与此目标相悖的事实却是，凡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后的国家里一旦这种新人出现，他们的命运却往往是下狱或者送入劳改营，即便他们是共青团员或是共产党员。少数例外地进入领导层的如两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与赵紫阳，也不能幸免这种悲惨的下场。其中有侥幸脱离这架吃人专政机器的控制，多义无反顾走上持不同政见之途。更多的人则屍骨无存，甚至姓名都被抹去。留名的少数，其单子也长无尽头。只举一人：遇罗克。在全中国只允许用一个大脑思考政治问题时，他试图发出一点独立的声音，尽管完全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但也立即被扼杀。毛泽东推介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新人”典型：雷锋。雷锋乐于助人，这是任何社会都公认的美德。但除此之外，他只是一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螺丝钉”。只须对照一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新人的描述，便可以知道其间之不同，不可以道里计。

与雷锋相较，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柯察金）要优秀得多，至少他不是一架只知重复领袖教导的录音机。在我刚刚懂事时，读过一本书叫《把一切献给党》，讲述的是一位中国的保尔式革命战士的生平故事。那是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甚至编辑请当时尚未留苏学习的延安出身的画家罗工柳画了水准直追列兹尼钦柯（《钢铁》一书插图作者）的插图，至今令笔者难忘。

很多年，近乎半个世纪后，我才知道那本书的执笔者叫何家栋。在我见到陈平几周后，何家栋在北京去世。

何家栋本人也是一名共产党老战士。他比陈平年长一岁。也是在 14 岁时参加革命，成为抗日游击队员。后来他成为一名编辑与作家。他的作品成为哺育我成长的意识形态中的部分教材。但反讽的是，他对党贡献了一切，却不断被迫害，从“右派分子”到“反党集团”，以至其母、其子均被害死。何家栋在他生命最后的 20 年里深入地反省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在，成为中共党内与李锐、李慎之等民主斗士齐名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共产党被异化了，刘宾雁等才是“真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几乎与何家栋去世同时，前东德间谍首脑马库斯·沃尔夫也去世了。我是从 BBC 广播中听到的消息。沃尔夫与何家栋同年生人。同样是反法西斯的老战士。他是少有的在冷战中深受敌方尊敬的人物之一；也因此 BBC 会关注他的去世。我相信陈平如果与他有机会相识，也会引为知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记得当年我们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回首往事有时很难理解为何我们失败了。年轻时，我们觉得仅凭坚强的信念就足以扭转乾坤。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信念太强，而是没有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理论去做。斯大林所犯的罪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对共产主义的践踏。

“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同我们引以为豪的其他成就一样重要。”

虽然他只负责对外情报工作，但他应该知道他的同事们是如何严密控制自己国民乃至自己党内同志的一举一动的，并且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他引用布莱希特的一句饱含讥讽的话：“一名共产党员头戴的钢盔上弹痕累累。有些是敌人的子弹打的。”

陈平奋斗终生，没有在马来亚夺得政权。是幸还是不幸？作为党的总书记与众望所归的领袖，假若他夺取了政权，他能够避免犯下他异国同志所犯的错误乃至罪行吗？在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镇压无辜，迫害百姓的活剧无一幸免地上演，区别只是在“错”与“罪”之间。因此原因不仅仅存在于领导人的个人品格之中，而且是“脚本”的问题。虽然马共没有掌权，但是发生在 1969 年的内部肃反扩大化惨剧，已经预示了这种可能性。陈平虽然对此没有直接责任，但至少他无力制止这场惨剧的发生。

我，一个比陈平小两轮的后辈，却从生下来开始便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这个社会正是陈平毕生奋斗想要建立、而未能建立的。由于身处不同的国家而有了这种颠倒过来的生命经历。我以我的切身体验认识到这个社会的虚伪，与它旗帜上标明的“民主、自由、平等”完全相反。这样一个结论，对于真诚地

为这一目标奋斗终生的陈平，是难以接受的，也太残酷。但是，他有过 28 年之久的目击旁观机会，不会不去思索这个终极意义的问题。陈平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开放胸襟。他说：“在这里，可以交换意见，最终推动世界。交换意见叫我雀跃。你可以对我说：你错了。你可以坦言，我失败了。不过我也会告诉你，它是怎样的以及我怎样尝试过。”

陈平并不是被迫结束武装斗争的。他有明确的认识：“以暴力为基础的革命不适用于现代的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假如人民生活不错又被融入了社会，你怎能叫他们铤而走险？你又何必这么做？”

“我依然是社会主义者。我肯定还相信平分财富，虽然那是驴年马月的事。我信仰各尽所能的真理。不过就马来西亚的国情来说，我肯定会放弃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施政蓝图的中心概念。”

在这些写在陈平回忆录尾声中的句子里，我注意到他已经用“社会主义者”代替了“共产党人”。而且明言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也等于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因此，我明白了陈平也一直孜孜不倦地与我一样在追问自己毕生认同的主义，并且从未为各种教条所框住。

因此他称我为“同志”，而我也引以为荣。

我们都曾参加了那一个堪称为当代巴别塔的“共产主义大厦”建设工程。如今那个工程已经半途而废。巴别塔的故事留在《旧约》。“共产主义大厦”的故事留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里。当年的建筑者如今散布四方。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一个当代巴别塔的前普通砌砖工，能与前建塔队伍中一位支队长兼父辈在地球上某一个点相会，并互称同志，是一件既快乐又感伤的事。

约会历史之六

回到悉尼当日，便接到诺玛的电话，说陈平给我寄来了帽子，嘱我去取。还想听听我们与陈平会面的故事。我们三人再度拜访了这一对陈平的莫逆之交。

帽子是用特快专递寄来的。

出乎我意外，帽子用的是纯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防绿布料制作的，但制作工艺不是工厂式的，显然出自丛林中后勤女兵之手。

帽式竟完全仿自英军在二战时期的样式：船型帽的周围是退化了的帽舌与帽耳，正面有两个布裹的扣子。船型帽在流行盛期有美式、苏式、英式、德式、奥式、意式……而马共选择了英式。这是最后一点殖民地宗主国的影响力吧？

但是在该有帽徽的位置，是一颗用不褪色的丝线，一针针绣出的鲜红鲜红的五角星。

我从未见过军帽上的红五星是人工绣出来的。

也许只有困居泰南森林几十年的马共女兵才能做到这一点。时间是充足的。但是信仰与热情保持几十年而不减，却是匪夷所思的。

陈平在解散自己的队伍时，一共有千一百八十八位成员。无论成败，这一千一百八十八颗用丝线一针针绣出的五角星，足以让他感到安慰了。

2006年12月31日深夜完稿于

澳大利亚邦定纳听雨斋